

仰止集

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

朱凤瀚 赵伯雄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仰 止 集

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

朱凤瀚 赵伯雄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仰止集: 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朱凤瀚, 赵伯雄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201-05590-9

I. 仰… II. ①朱…②赵… III. 王玉哲—纪念文集
IV. 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018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5.5 印张 6 插页

字数: 400 千字 印数: 1-1,000

定 价: 58.00 元



王玉哲先生（1913-2005）



王玉哲先生在工作



王玉哲先生与学生们在一起

春雨青燈靛花巷
霜天紅葉寶臺山

時在二十又六年冬老友繼愈沐手書于北京南沙溝

抗日戰爭時期維商王哲學長與余讀書于北大文
科研究所初在市内靛巷因寇機肆擾乃在郊外寶臺山
構屋數椽作為宿舍敝衣蔬食刻苦讀書心繫天下興亡縱論

古今得失先陰不再維商仙去謹述往事以寄哀思



痛悼玉哲師



淡影遙看玉哲師
朦朧淚眼若存疑
秋湖鏡
談經日夜雨瀟瀟
辨現時水畔垂楊依舊在
史壇素履更誰移
先生去天涯道
只恐傷心寄語遲

范曾丁亥年夏於南開



前 言

光阴荏苒,又是一个五一长假。春意将阑,大地重又现出勃勃生机。转瞬之间,我们亲爱的老师王玉哲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两年了。回想 2002 年,我们为庆贺王先生的九十华诞,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先秦史学界的朋友数十人前来参加。那时先生虽然行动不便,但是思路清楚,精神矍铄,在开幕式上还讲了话,他感谢各地的朋友们前来为他祝寿,还向大家谈起了自己的长寿之道。那时的我们,看到先生健康状况良好,无不额手称庆,期以百年。詎料先生于 2005 年春偶染肺疾,竟至不起,于 2005 年 5 月 6 日遽归道山了。

先生讳玉哲,字维商,河北深县人。生于 1913 年旧历正月初二日。1936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七七事变以后,随校南迁,1940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旋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随唐兰先生读研究生,1943 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先后受聘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1948 年到南开大学任教,此后便没有离开过南开。

先生的一生,主要从事的就是这两件事:读书治学,教书育人。他爱国家,爱民族,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他爱读书,爱钻研,唯真理之是求。他爱家人,爱学生,是一位慈爱的长者。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典型。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教育事业,贡献给了学术研究事业。我们,作为先生的亲炙弟子,对先生学问的渊深与道德的高尚,有着切身的体会。如今先生已去,但他的道德文章,将长

留天地之间。两年以来,先生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历久而弥新。师恩浩荡,教泽绵长。我们唯有努力工作,使薪虽尽而火得传,庶可报先生恩德于万一。今与同学诸君合议,决定编一本文集,以寄托我们对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这本文集,收入了怀念先生的文章十二篇,第一篇的作者兰仲君,是先生哲嗣。其余诸人,均曾亲聆先生教诲。本书收入学术论文二十七篇,作者中有先秦史学界的著名专家如吴荣曾、李学勤等先生,也有很多是先生的学生、晚辈。自从我们发出约稿信之后,同学诸君之外,史学界的前辈、朋友纷纷赐稿,使此书得以顺利编成,我们在此谨致谢忱。

王先生的生前好友、已届耄耋之年的任继愈先生、王永兴先生,听说我们要编文集的消息之后,或赐题词,或赐文稿,我们深感荣幸,并在此向两位老先生表达我们的敬意和谢意。

还要特别感谢范曾先生,是他的慷慨资助,才使本书得以出版。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谨以此书,献给王师玉哲先生在天之灵。

朱凤瀚 赵伯雄拜手恭撰

2007年5月6日

目 录

前言·····	(1)
忆父亲·····	王兰仲(1)
治学做人 正直不阿 ·····	王恩厚(11)
深切怀念慈父般的师长王玉哲先生 ·····	孙香兰(17)
忆玉哲师:关爱与宽容·····	刘泽华(20)
薪传唯求是 ·····	陈生玺(24)
创业维艰启后人 ·····	梁吉生(27)
深切缅怀王玉哲先生 ·····	张景贤(29)
春风化雨育后生 ·····	李瑞兰(31)
怀念我的老师王玉哲先生 ·····	赵伯雄(34)
山高水长长相忆 ·····	邹牧仑(38)
恩师是我永远的楷模 ·····	张荣明(49)
王玉哲先生指引我走上先秦史研究之路 ·····	徐 勇(51)
论李靖 ·····	王永兴(55)
《周礼》和六国刑制 ·····	吴荣曾(67)
论鞆鞆铭及周昭王南征 ·····	李学勤(76)
商代疆域新概念 ·····	孟世凯(81)
蜡祭小议 ·····	詹子庆(92)

河洛文化的历史渊源	李 民(96)
论古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	晁福林(103)
儒家“天人合一”观的历史理性与现代价值	李瑞兰(119)
炎帝和炎帝文化的南迁	赵世超(123)
中华书局校点本“两唐书”质疑二十则	马俊民(139)
竹简秦汉律与《周礼》比较研究	朱红林 陈恩林(158)
试论殷墟卜辞中的“春”与“秋”	朱凤瀚(170)
西周领主土地宗法伦理形态研究	巴新生(188)
思孟心性说辨异	彭 林(208)
《尚书》“伪篇”《伊训》新探	罗运环(215)
论国家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袁 林(222)
汉代章句考略	张荣明(258)
利簋铭文与我国所见最早的星占术	王 晖(273)
殷周“地—母”崇拜与原始本体观	何 平(283)
江西古代的民族	邵 鸿(292)
商族起源于京津唐环渤海湾说	朱彦民(313)
先秦农业的发展与青铜农具的兴衰	印 群(335)
气候变迁与商人南下	张渭莲(342)
叔父鼎的定名与西周历史上的父国	陈 絜 马金霞(353)
族氏铭文中“亚”的含义	何景成(368)
先秦文献中的“冢宰”	李 晶(380)
战国古玺中的尉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鲁 鑫(390)

忆 父 亲

王兰仲

半夜一点,我被电话铃声惊醒,是姐姐兰珍越洋打来的电话:父亲于5月6日凌晨去世了。我长跪于地,向家乡的方向遥拜,为父亲送行。当内子宏丽扶我站起时,我已然是满面泪痕。其实我早已有这个思想准备了。今年二月父亲病重,我与宏丽赶回国内,我已经意识到父亲即将走向他生命的尽头。可是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我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确实去了!

父亲是宽容的。对子女,他从不强求我们学哪一行,或是做什么,只要不浪费生命就好,听其自然;对学生,他从不要求别人遵从他的观点。他常说,事事追随先生,不会有什么大的成绩的。做学问,一定要发前人所未发,有自己独到之处。这种无为而治的风格,也许和他早年于北大学习时所受的自由学术风气之熏陶有些关系吧。听父亲讲,早年北大与清华不同。清华进难出也难,而北大是门坎高、墙头低,进北大很难,但进去后,却基本上让学生自由发展。他上大一时,修孟森先生的《明史》,先生每次上课一定点名。一些学生没来,便由其他学生代报,先生知道,也不以为意。快考试了,一个同学问:“孟先生,下周就要考试了,您出什么题目啊?”先生摘下眼镜,向下面看了看说:“今天下面都是‘代表’,人太少。我把题目告诉你们,没来的同学怎么办呢?”下面学生答:“我们可以转告他们。”于是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三道题,说:“就考其中的两道。”父亲从刘文典先生修《庄子》。父亲讲,刘先生上课从来是手(或嘴)不离烟。第一天上课,先生就讲:“我可不懂庄子,我可不懂庄子,我只懂得一点。世界上没有人懂得庄子,懂得一点的人也只有三个,一个是马叙伦先生,第二个是个日本人,第三个就是我。可是他们俩都不如我懂得多。”先生的话引来哄堂大笑。父亲说刘先生很天真,他确实是这么想的,倒不是故作幽默。

父亲从钱穆先生修先秦史,先生说别人都是从前往后讲,我是从后往前讲。钱先生从战国讲起,往上讲。先生并不是面面俱到,但往往一个小问题,就讲几周时间。从如何发现问题,分析史家不同观点,史料中矛盾之处,步步讲授。父亲讲,确实受益匪浅,比简单学一点知识要强多了。父亲说当时很多同学喜欢一下课就围住钱先生自我介绍,问东问西。但父亲从没有去过,只有当写出第一篇论文《晋文公重耳考》后,才拿去请钱先生指教。钱先生对之非常欣赏,提出意见,并亲自修改。从此父亲与钱先生结下了很深的师生友谊,成了“宾驹先生之高足”(汤用彤先生语)。

记得“文革”中,我进了天津第一石油化工厂学徒,当时只有十五岁。父亲只是提醒我不要蹉跎岁月就好了,并不强求我一定学什么。他英语不错,但并没要求我跟他学英语(宏丽多年后曾当面埋怨他为什么不使用家长的权威强迫我学点英语,也省得日后受那么大的罪);他以治史为业,但并不要求我跟他学历史,虽然他也有时作过这种暗示。记得一次康殷先生给父亲寄来一篇古文字研究的论文向他请教,父亲认真阅读后,复信提出意见并给予鼓励。康先生当时身在农村(是被遣送回乡的),只是人民公社社员,他接到父亲的回信非常感激,来信讲:“先生指出我的错误的地方,正是我为之汗颜的,而称赞的地方,正是我最得意之处。我曾寄稿子给商承祚先生,商先生讲下次你把五好社员的奖状寄来就行了。”当时父亲对我说:“这个人很聪明,也很刻苦,如果你能达到他的这个水平,我再给你一些指点,你在甲骨文上就可出些成绩了。”可是我当时哪里听得进去呢,只是一心一意地做着作家梦,一下班就写小说。其实我根本不是写小说的材料(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文学家的),那时一夜一夜地写倒是写出不少,但一拿出去都给“枪毙”了。记得当时《天津文艺》詹岱尔老师和谭成健老师因为认识兰珍,还专门找出一篇我的稿子(我记得标题好像是《朝霞》)好好帮我分析了一通,结果发现逻辑严谨,没有前后不呼应、不合理的情节,但“就是不像小说”。显然,我这个脑子不是搞形象思维的,大概天生就适合写计算机程序吧。宏丽讲我这个人平时稀里糊涂,但写起程序来逻辑却非常清楚,无怪乎今天我能在计算机工程领域小有成就!话说远了。父亲后来与康先生常有通信,“文革”后,当父亲创办南开博物馆专业时,又聘请当时尚无工作的康先生来南开讲学。后来康先生成了有名的学者,但对父亲仍非常感激与尊敬。父亲常常对我说:“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

父亲人很随和,很少见他与人激辩从而试图说服对方同意他的观点;但同时,他也很固执,你很难让他改变观点。记得“文革”批林批孔之时,在天津市委举办的一个“评法批儒”的座谈会上,父亲发言说,其实先秦以后儒法之争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市领导某人立即批道:“这种错误观点与江青同志‘儒法之争一直延续了两千年,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指示是不相符的!”父亲当时只是微微一笑,便不再讲话了。“文革”后,一位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对父亲讲,如果您当时争辩一下,现在就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了。父亲笑笑说:“我可没那个胆识,只是不说或少说违心的话就是了。”那时全国都遵从郭沫若先生春秋与战国之交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说法,对此,作为西周封建说的代表人物之一,父亲是有保留的。记得我曾问他,如果从此所有的教科书、所有的教师都是这么讲,你怎么办?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说:“那我就改行去搞明清史了,我对近三百年学术史也很感兴趣。”我震惊了,父亲搞了几十年先秦史,可以说先秦史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可他居然要改行!

其实父亲对政治是从来不感兴趣的,他时常向我夸耀,称自己上学时左派的学生、右派的学生都来找过他,但都被他婉转推辞掉。一次,一位从中学时代就一直是好朋友的伯伯拉他进诚社,说了一晚上,最后父亲还是一句话,我只想多念念书,结果不欢而散,虽然他们依然是好朋友。父亲解放前多年竟没有参加过一个政治组织。但是“文革”刚开始时,父亲却因为“政治嗅觉极为迟钝”(母亲语),差一点倒了大霉。“文革”是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父亲对姚文元无限上纲的棍子文风与观点不以为然,在《光明日报》的鼓动下,写了一篇“与姚文元同志商榷”的文章,准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校样已经寄来了,被母亲看到,不禁大吃一惊,说父亲:“你怎么这么麻木不仁呢,今天与五七年反右时很像,决不是你说的学术之争!”在母亲的坚持下,父亲立即给《光明日报》写信,谎称文章尚需润色,将原稿索回。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大家都知道后来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文革”后,有一次王连生先生陪同父亲去厦门大学学术交流,听连生先生讲,父亲告诉老友韩国磐先生此事时说:“我老伴儿救了我一命。”

母亲出身不好,出生于一个旧官僚家庭。外祖父张济元将军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他的同学中我听说的有阎锡山、孙传芳、杨宇霆等人),曾经出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战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大舅解放前是北

京(前北平)警界首脑,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三人调处小组到达北京,大舅负责安全保护。当时学生们和平请愿,与警方发生冲突,叶剑英将军抓住大舅的手腕说:“今天如果死了一个学生,我拿你是问!”大舅向叶将军保证,不会有流血事件发生。大舅命令所有的军警下刺刀、退子弹,结果没有一名学生伤亡,反倒是警员中有不少受伤的。北京和平解放,大舅随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也算起义人员,但很快就按历史反革命逮捕入狱了。另外母亲还有一个弟弟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一个妹夫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另一个弟弟“文革”中自杀身亡。所以,她总是心有余悸,成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总怕运动来了,又要受到冲击。在多年压力下,母亲身心受伤,久病在家,父亲对母亲的照顾无微不至,多年来从无怨言。他们老夫妇的感情,用兰珍的话说是“平如水,甜如蜜”,虽然从来没有如火的热烈,但像醇厚的陈年老酒,很有味道。

我在美国与宏丽一起努力,经过艰难的数年奋斗,于 1994 年终于取得了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1995 年又加入了著名的惠普公司(HP)。记得 1996 年我去日本出差,回家看望父母时,父亲说我给你讲个历史故事。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之姐看上大臣严子陵,刘秀于是想让子陵休掉妻子与其姐成婚。严子陵坚拒道:“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不禁失声对屏风后的姐姐说:“阿姐,媒不成也!”我当然知道父亲是希望我不要忘记与我多年来患难与共的妻子,就回答说:“爸爸放心,我不是陈世美。”父亲讲:“我也知道你不是,但有些人往往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我阅人广矣,这类事历史上、现实中见得太多了,我只是给你提个醒罢了。”

我这个人脾气暴躁,毛头火性,受不得委屈。记得在工厂学徒时,有人常借开玩笑占我便宜。一次,一个人打我头一下就笑着跑开了,大家也都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拾起一块方砖砍过去,砸在他拿的扁担上了,从此没有人再欺负我了。父亲对我这种处世方式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没涵养不是英雄行为,反倒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危险。他告诉我 1966 年附中红卫兵来抄家,当时父母都受到她们的侮辱,他们最担心的却是怕我回家来,与她们撞上,受不了她们的侮辱和她们拼命,那样后果会不堪设想。父亲常给我讲一个故事,“文革”中南开师生到“七零四七”地铁工程去劳动,中文系朱维之先生当时已经六十五岁了,身体虚弱,也不太会干活。用铁锹挖河是很艰苦的工作,年轻人也会吃力的,更何况六十五岁的人呢?当时一位工宣队的师傅大骂

朱先生笨蛋，挣这么高的工资，这点活都干不好。父亲说朱先生并没有恼怒，也不与之争辩，只是一笑置之。父亲讲这就是涵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这么做的。反之，父亲讲他的好友、老同学北大教授汪钱先生，人很正直，疾恶如仇，学问很好，也很聪明，但就是毛头火性，这在老同学中是有名的。“文革”中他因为受不了红卫兵的侮辱，自杀身亡了。我对父亲说汪伯伯有知识分子的骨气，可谓士可杀不可辱！汪伯伯被迫害身亡，这不是他错。父亲说，我同意，但你有没有想过，有时活着比一死更难些，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毅力。韩信当年如果不能甘受胯下之辱，也不会有后来的成功。说到汪先生的脾气，父亲曾给我讲过一段鲜为人知的趣事。当年在宝台山读研究生时，父亲与周法高、殷焕先、汪钱诸同学同住研究所的图书室。汪先生很刻苦，一夜夜地念书，写卡片写了一抽屉，全是用毛笔写的绳头小楷，但玩起来也是“奋不顾身”，一进城打桥牌有时数夜不归。回来一看，老鼠已经在他的卡片中下了一窝小耗子，卡片自然全部咬碎了。他只好又重新开始，一张张地写起。汪先生比较邋遢，汤用彤先生嫌他不整洁，要他搬到其他房间去住。父亲告诉汪钱：“汤老头儿（同学们尊称汤先生老头儿）嫌你太邋遢，要你搬出去呢。”汪钱一听就火了，说：“不行，凭什么让我搬走？我找他去。”父亲说：“你不要去。”他说：“我就是要去。”破门而出。一会儿汪钱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笑着回来了。父亲问：“你真去了？”他讲，我去了一脚就把门给踢开了，把老头儿吓了一跳。汪钱说：“汤先生，我不搬走，我开始要潜心工作了，这里看书方便，也可与他们互相讨论，我不搬。”汤先生说：“不搬就不搬吧，这是怎么了？”汪先生顿觉语塞，无话可说，灰溜溜地跑回来了。父亲只有叹气：“你这个脾气什么时候才能改一改啊。”

谈到宝台山上联大图书室，使我想起父亲讲过的另一段趣事，因为涉及数位当时学界的名人，不得不实录于此。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建校的。当时南开自认不如其他二校，凡事退让一步，与两校关系都还不错。但北大、清华却是互不服气，常常有些小的摩擦。当时北大罗常培先生是联大中文系系主任，清华冯友兰先生则是联大文学院院长。一天，清华闻一多先生来图书室看书，找到两本书，向图书室管理员、父亲的师弟王达津先生登记要借走。达津先生说，罗先生有规定，所有图书借出，一定要经过他的签字才行。闻先生很意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原以为那只是为学生做的规定，教授们则不必呢。”当时气氛有些尴尬，父亲讲在旁边看着闻先生的脸逐渐变